

美國民族性

高勒著
吳澤炎譯



Geoffrey Gorer 著
吳澤炎 譯

美 國 民 族 性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三 初版

(28679)

性一册

版翻

發行人

陳 懋 解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目錄

緒言	一
第一章 歐洲和被丟棄的父親	一七
第二章 母國	四五
第三章 完全美國化了的孩兒	六六
第四章 愛情與友誼	一〇三
第五章 人是機器麼？	一三二
第六章 事物的世界	一五二
第七章 成功和金元	一七二
第八章 出人頭地	一八九
第九章 較小的支系	二二一
譯者跋言	二四八

美國民族性

緒言

個人爲一切的根底，

我現在誓言：在我看來，凡是抹煞個人的，都不是良善的，

美國是由個人合作立約而成的，

祇有與個人打商量的，纔是真正的政府……

——魏特曼在藍色的奧泰里亞湖之岸 (Walt Whitman, By Blue Ontario's Shore)

在本書中，我打算用文化人類學上的若干方法和真和灼見，應用於研究一個偉大的現代國家。我於一九三五年第一次訪問美國，在梅特 (Mead) 本納狄格特 (Benedict) 和陶拉特 (Dollard) 三位博士指導下，接受人類學的訓練；自從那時起，一連串的意外事件，使這兩個論題在我的生活中始終保持支配的地位。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我在錫金 (Sikim) 的勒伯佳人 (Lepchas) 中，作了一次就地的考察，在當時我認爲祇是以後將連

續舉行的第一次考察而已；但是考察歸來，我的健康受到恆久的損害，所以至少在今後的幾年內，我不能考慮在原始民族中作再度的遠行。生活的艱苦，食物的惡劣，和醫療的缺乏，在原始區域中原是免不了的。

因此我極愉快的接受了洛氏基金團 (Rockefeller Foundation) 的邀請，擔任根據『人類學的觀點』研究電影及無線電對於美國觀眾和聽眾的影響。這一個調查的性質，雖然不免祇是一個極大範圍研究的初步調查而已，它對我有一個好處，就是使我得以遍歷了美國的許多地方，和熟習了美國社會學家對這些以及有關論題的研究成績。等到調查全部完成以後，我又得基金團理事長梅博士 (Dr. Mark May) 之邀，參加雅魯大學的人類關係研究所 (The Institute of Human Relations of Yale University)。這一個邀請，除了給我機會增進我對於人類學、行為心理學和心理分析的瞭解與知識外，也給了我一個詳盡研究美國兒童和青年心理的機會。研究所裏有位同事心理分析學家秦恩 (Earl Zinn)，曾經對一位患人格分裂症 (schizophrenia) 的新英格蘭青年 (新英格蘭指美國東北六邦——譯者)，作過四年的分析，並用電記下整個的分析。秦恩請我合作，根據這樣記錄下的大量資料，寫成這個青年的生活歷史。我因為對於病者的兒童及求學時代，缺乏判斷何謂

『正常』的標準，我不得不以談話以及若干調查的方式，研究普通人所有的行為型式。爲了發現這個青年人性格分裂者的早年生活和行為中，有些什麼特殊的徵象，我不得不對沒有發生這種徵象的青年的早期生活，作了一番相當確實的研究。本書中的許多材料，尤其是關於討論兒童及青年期的資料，即由這種研究而來。

離開雅魯以後，我到華盛頓 京兆區，參加英國戰時代表團之一。當時我做的一部分工作，爲擔任聯絡，代表倫敦的辦事處出席美國相等機關代表的會議，和隨時以美國的態度、批評及建議，報告倫敦。在爲共同目標而作同甘共苦的努力之時，雙方雖然保持良好的合作，但這個工作，卻把存在於大多數我英美同僚心中的、因戰時緊張而緘默不言的異議和嫌惡，輪廓分明的顯現了出來。鑒於我多數美國『對手』，是舊日專業同事，所以我得以聽到許多關於英國活動的坦白批評，而在正式的會議中，爲了客氣之故，這種坦白批評照例是不肯說的。

經過前後幾年的經驗以後，使我明白看出，英美之間雖有不可勝計的異議，但在大多數人背底裏，卻有一個單純的根本態度。英國人爲了美國人的不能設身處地，站在英國人的地位而行動思想或言論，便變成反對、藐視或憤恨美國人；反之美國人爲了英國人的不

能設身處地，站在美國人的地位而行動思想或言論，便變成反對、藐視或憤恨英國人。英、美兩國人因為同具大同小異的共同語文，共同宗教，共同政治思想，共同法律，共同的體格型式，所以每方都假定對方是和自己一模一樣的，等到這種假定證明與事實不合時，就不免失望與痛苦交併了。

這種共有因素的存在，對兩國間長期的政治關係，誠有重大的貢獻，但我深信，在日常的事務中，認英美為一體或完全相同的信仰，適足成為阻止兩國人民作互相瞭解和合作的最大障礙。

在兩百年前，英國居民和美洲殖民地人民之間，相同之處幾乎一定要比相異的地方大得多。但由於過去兩世紀不同的經驗和發展，結果造成了兩種不同的社會，各具不同的價值制度，特殊的行為型式，不同的宇宙觀和對其本身在世界中所占地位的觀感影像——一言以併之，各具極端強烈的不同的民族性。

這種差別，具有基本的性質。其間的問題，並不是說某一種行為方式較好，或某一種行為方式較壞，或者說某一種特性比較可以讚美，某一種特性比較可以抨斥；兩者之間，實在並無適當的理由，作揚此抑彼的比較。祇有識見極狹隘和鄙陋的人士，纔會因為自己

以黑衣爲喪服，而認中國人喪服用白爲『不當』、爲『不道德』；因爲喪服無論用白用黑，都在於有效地完成同樣的社會目標。我們同樣承認，不同的人羣對於解飢的食物，有各不相同的偏好，這種差別不至於引起我們道義的憤怒。如果有人強迫我們食用其他社會所偏愛的食物，也許會引起我們的憤恨；但誰會對中國人的歡喜吃燕窩，或愛士基摩人吃腐朽的海豹肉，或澳洲土人吃樹上的蟬蟪，認爲『不當』或『不道德』呢？回教徒斥責我們吃豬肉，或印度教徒鄙視我們吃牛肉，我們中有誰認爲這種反對是合理的呢？但是等到一個問題涉及價值，涉及不同的觀察和解釋世界的方式，涉及有所強調和有所緘默，涉及不同的希望和恐懼，我們不偏不倚的公正心理大概就會杳如黃鶴了。我們感覺到、並且對外宣布說，我們的方式是唯一正當的方式；所有其他的方式都是錯誤的，其合於正當的程度，就看它們合於我們方式的程度。我們打算強迫實施一個單一的標準，等到遇到其他人民對於我們所認爲自明之理的真理，甚至礙難承認之時，我們便感到苦惱和憤怒了。

這種勢所必至的自我中心思想，使我們要在地位相等、時代相同的民族之間，討論民族性的長短得失，變成非常的困難和複雜。一個用意十分客觀的說明，很可能被任何民族的讀者解釋爲存心批評。如果讀者是屬於說明中所提到的民族，他可能會把說明中客觀的

語調，解釋爲缺乏瞭解和同情。這一種情感，和聽見自己聲音記錄片後所引起的觀感，頗有幾分想像。如果讀者不是說明中所提到的民族的一分子，他極易心不自主，把說明中所述的行爲型式，和他自己所有的對本身特性與社會所抱的偏頗自滿的見解，互作比較，然後再把兩者的差別，作躊躇滿意的判斷：『謝謝天，我不像其他的人那樣……』。

爲了儘可能把因不友誼批評而起的觀感、以及僞信的自滿心減低至最低限度起見，我在本書中已盡力之所能，盡量避免把美國人的行爲與任何其他社會的行爲從事比較，同時卻設法指出相同的地方。所以除了偶然少數幾次，因爲要陪襯出同樣字句所表現的不同含義，似有必要外，我尤其力求避免提及任何可作比較的英國人的行爲。我深知有若干部門中所敘述的英國人的行爲，其實也很可說是美國人的行爲，但是除非把全體各點作通盤的有系統的比較後，否則單是注意局部的相同之點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希望不至於引起不友誼批評的觀感，以及僞信的自滿心，固然是我避免作比較的動機之一，但我還有一個更迫切的理由，即由於我的淺薄無知。我所有關於英國（或任何歐洲社會）的知識，不足以使我作一貫的比較。除了對於我們自己的社會及其價值，我們全都不免目光錯亂以外，而且由於我所受的教育和出身的階級，我有我自己的限制和偏見。我所

有研究英國生活的機會，也絕難與研究美國生活時所有的機會相比；我在英國社會接觸的範圍，要遠爲狹隘得多；甚至即使就地理上而言，我對英國所有的知識也要比對美國所有的知識少得多。除了作極短期的旅行以外，我所知道的僅限於英國的南部和中部；在我畢生中，我在康橋 (Cambridge) 以北始終未曾有過兩個月的耽留。反之在美國四十八州中我到過四十州以上，我所完全不知道的只有兩個區域：西南區（新墨西哥、亞利桑那 Arizona 尼伐達 Nevada）和西北區（華盛頓、奧里岡 Oregon、愛達和 Idaho）。這兩個區域，地面面積雖極廣大，但人口極爲稀少，所有六州的人口，僅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三，所以我認爲對這些區域缺乏瞭解，並不足以動搖任何我所得到的任何結論。我大部分的時間居於華盛頓 京兆區，這一個以政府爲生業的都市，其本身也許不能代表它自己地域邊界以外的任何一切，但在它小小的境域以內，吸聚了聯邦內每邦（州）的許多居民。

本書祇討論到美國國內三分之二的居民。南部諸州的歷史、傳統、和甚至大部分的人口，以及等而下之的塔克薩斯州 (Texas)、農村式的新英格蘭諸州，加里福尼亞州，和全國的其他部分都有顯著的不同，如欲對這種細分的文化，逐一作適當的討論，非需要另一本像本書篇幅的書不可。除了本書第八章以外，關於這個區域內比較占少數的分子，無論

種族上的、宗教上的或社會方面的，我都沒有加以論列。還有一點也許需要特別說明的，即我的敘述祇限於過去十年中的美國人民。

不過即使把最顯著的例外除外，如要對分布在半個大陸、數近一萬萬的人民，作準確的綜論，似乎也是很困難的。這個困難的因素，在舊世界（歐洲）也許更有力量：因為在歐洲，由於多少世紀以來的孤立，各地各有地方的傳統，婚姻互不相通，結果所至，可以預料得到在不同人羣及不同地域之間，將產生出重大的差別。不過美國的歷史，除了少數例外外，卻剛好缺乏這種的孤立、地方傳統、和親族交婚。大西洋沿岸以外大部分美國人民是在鐵道興建以前不久到達美洲的，很少人在同一地方，有過世代相傳的歷史，所以也缺乏那種對某一特別區域的強烈感情。在一世紀以前還是由印第安土人和野牛出沒其間的地方，是不能有根深蒂固的地方傳統的。當然在不同的地域之間，存有彰明昭著的差別；在有些地域，因為具有同一傳統的移民占居絕大優勢，所以呈顯出地方的色彩，例如密尼沙達州（Minnesota）的斯坎底那維亞半島（丹麥、挪威、瑞典）人；威斯康辛州（Wisconsin）、伊利諾州（Illinois）、和本薛爾凡尼亞州（Pennsylvania）的德國人；麻色諸塞州（Massachusetts）的愛爾蘭人；塔克薩斯州的墨西哥人；魯易西安那州（Louisiana）西部操

法語的阿寇底恩人 (Acadians, 加拿大西南部法國殖民地，於一七一三年割讓於英國，當地居民操法語——譯者)。還有些區域，大多數居民集中於一種行業，減少了居民之間的差別，和限制了居民的希望，例如蒙泰那州 (Montana) 的礦業，或懷明俄州 (Wyoming) 的牧畜業。但這些祇是一個共同型式的浮面的變動而已。

一個專家可以根據語言習慣的微細區別，作精密的語言差別的分析，藉以發現出某一美國人在百哩以內出身的所在地；但是就全國三分之一的人口、五分之三的地域而言，這種語音的差別，祇是確鑿表明地方色彩的出身和教養而已。詩人魏特曼對於大部分現代美國的心理發展，曾經有明白的預見，用他的話來說，美國有種『民主的平均性和基本的平等性』；有了這種特色，纔使我們能作性質廣泛的通論。

此處也許須特別聲明的，這種民族性的概念，絕無否認個性差別的意思，也不是說所有美國人無不表示下文所述的種種特性。這個概念的全部意思，是指所謂一個人羣的特色體系和行為模式，是指那一個人羣內占重要數量人士所共同表現，而為其他大部分人所贊許或同意的；而且這種特色體系和行為模式，曾為形成整個社會生活制度的最有影響的因素。所以我在書內用『美國人』一詞而並不加限制解釋之時，讀者不妨把這個名詞的意思

擴大，讀作『美國人中占重要數量的人士』，或『大多數美國人的情形』，或『如與其他
人羣比較，美國人毋寧更傾向於……』——不過如果爲了細密精確起見，經常使用這種累
贅的詞句，就不免使行文佶屈，不易卒讀。

我曾檢討若干典型關係中習慣的和意料中的行爲，如子女對父母、父母對子女、夫
婦、愛人、朋友、隣里、商業同行和競爭者、資方和勞方、多數對少數、美國人對外國
人等等，由而設法把根本的和形成美國人行動的恰切的主題，一一分別討論。在技術上，
這種研究方法，就其範圍和一貫性而言，是一種新奇的方法。不過有一個重要的缺漏，書
內完全沒有提到宗教的任務，以及教區居民和教士間的關係。這是一個性質嚴重的缺漏；
尤其是在農村方面，基督教有極大的社會重要性，從它所產生的概念，具有極重要的影
響。這種缺漏，一方面起於我的無知，我缺乏足夠的經驗或知識，堪以作準確的概論。我
雖曾一貫的把我所能取用的材料，作了一番科學的考慮，正好像我對任何其他人類學材料
所取的態度一樣，但因為我在先在美國時，並沒有計劃寫這本書，所以沒有存心收集我的
材料。除了研究那個虔誠的合衆教會教徒 (Congregationalist)、人格分裂症患者以外，我
在美前後所擔任的各種業務，都無從和美國國內的宗教生活有一貫的接觸。鑒於我對於那

些有心理重要性的事件，完全祇有間接或輾轉傳聞得來的知識，所以我決定爽心完全置之不論。

本書是根據可以稱爲『心理文化』觀點，來研究美國人特性的第二本著作。一九四二年梅特女士 (Mayaret Mead) 著了一本知己知彼 (And Keep Your Powder Dry) (註1)。『討論美國人特性的長處和弱點——我們可以獲取戰爭勝利的心理準備』。該書的主要目的，是企圖以『我們所有的知識和真知灼見，在人類學家的本位上儘可能的幫助獲取戰爭的勝利』。梅特博士心裏存有這個凌駕一切的目標，所以集中全力於把美國人的道德原理作詳細的分析，和除了少數偶然提及之處外，對於美國生活中這種道德原理不發生作用的領域，完全置而不論(註2)。書內關於美國人道德地位的說明，在我看來似乎極爲詳盡和完備，我所以不想再踵事增華。我曾經把梅特博士的結論，作若干撮要的敘述，我也參考過她書內有關的各章。

梅特博士書中研究到美國家庭的特殊發展，啓示了我所繼起遵循的路徑。在兩書之中，若干重覆之處是勢所難免的；凡梅特博士已提出充分文證的各點，我僅以撮述她的結論爲限。我沒有參加任何的爭辯；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專家，把兩書一比，可以很容易看

出有少數地方，我和她有不同的解釋，至於我偏重不同的地方，則處數更多。

我在知識上所得於梅特博士者，實無法作充分的表達。我在文化人類學方面所受的許多訓練和所取的方向，我從她書中所得的關於美國人特性的資料，以及由多少年來長時期的談話，使我關於英美特性不同之處，有更進一步的眞知灼見，我都深受她的嘉惠。不幸我始終不曾養成把談話內容摘記下來的習慣；所以在書內很可能援引了原來由她所提出的觀念和公式，而沒有作適當的聲明鳴謝。我請求讀者寬恕這種無心的失禮之處。

我曾設法使本書的附註不至太多，因此之故，我對於前人對同一題目的許多論述，有些是和我的見解相合的，有些是和我的見解抵觸的，不曾一一註明。我曾由許多著作中得到透澈的瞭解，其中我願意特別提出的，有白洛庚的美國問題 (Dennis Brogan, *American Problem*, 一九四三年倫敦出版)、蘭斯威爾的個人的不安與世界政治 (Harold D. Lasswell, *Personal Insecurity and World Politics*, 一九三五年紐約出版)、愷塞林的解放的美國 (Hermann Keyserling, *America Set Free*, 一九二九年紐約出版)、托克維爾的美國民主政治 (一八二四年巴黎出版)。赫頓的如日中天的中西部 (Graham Hutton, *Midwest at Noon*, 一九四六年芝加哥出版)，或根室的美國內幕 (John Gunther, *Inside U. S. A.*,

一九四七年紐約出版），我直到本書完稿後纔獲拜讀。

羅般 (Elmo Roper) 曾替幸運雜誌 (Fortune) 從優良的民意測驗中，對過去十年作過一次有系統的調查，我從這個調查中獲得大宗的資料。我不願在本書本文內，插入統計的表格，所以書內關於這方面的來源，沒有作直接的援引；但本書內一大部分的陳述，都可以由參證幸運雜誌的測驗，獲得統計的證明。

書內的材料，有許多是根據於多年來在美國各地舉行談話和討論而得的。在當時我已以及談話的對方，都不知道後來我會寫這一本書，所以對於他們所提出的、沒有另外見之文字的說明或見解，未便舉出提出者的姓名，以免有失公允。不過我自知會由下列各人取得資料：奧登 (Wystan Audon)、倍特孫 (Gregory Bateson)、本納狄克特 (Butt Benedict)、喬治·狄遜和蒲加·狄遜 (George and Poca Dession)、約翰·陶拉特和維克杜荅·陶拉特·厄列克孫 (Erik Hornburger Erikson)、傅勒 (Helen Fuller)、浩爾 (Kay Halle)、漢斐爾特第四 (David Hearfield)、荷爾姆契 (Allen Holmberg)、歐文·加尼斯和瑪喬麗·加尼斯 (Irving and Marjorie Jaris)、真寧斯 (Isa Jennings)、寇斯泰恩 (Lincoln Kirstein)、恩斯特·克里斯和瑪利安娜·克里斯 (Ernst and Marianne Kris)。